

中国语文教育五千年

白金声 编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中国语文教育五千年

白金声 编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语文教育五千年 / 白金声编著.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038-8419-1

I. ①中… II. ①白… III. ①语文教学－教育史－中国
IV. ①H1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4665 号

出版：中国林业出版社(100009 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内大街刘海胡同 7 号)

E-mail：Lucky70021@sina.com **电话：**010 - 83143520

发行：中国林业出版社总发行

印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印次：201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8

字数：300 千字

定价：32.00 元

积极汲取我国传统语文教学的宝贵经验

(代前言)

我国语文教学绵历数千祀，可谓源远流长。几千年来，积累了丰富和宝贵的经验，在各个方面都有不少的成就。这些有关语文教学的理论和实践，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批判地继承和借鉴传统语文教学的经验，吸收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建立新的语文教学理论、深化语文教学改革、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无疑都是大有裨益的。

下面就我国传统语文教学中的教材、原则、方法谈几点认识。

一、关于蒙学教材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学，存在于启蒙教育之中，历久风行的小学课本便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被誉为“千古奇书”，相传是宋末大学问家王应麟编撰，三字成句，句句叶韵，内容丰富，涵盖极广。《百家姓》为宋朝无名氏所作，将百家姓氏连缀成四言的话，通俗浅显，流畅和谐。《千字文》作者是梁武帝时期的周兴嗣，全书千字，四言押韵，有“小百科全书”之称，流传久广。

“三、百、千”总字数合起来是 2720 字，除去复字，单字是 2000 个左右，符合儿童初步识字量的要求，内容相互配合，形成一整套官定的通用蒙学课本。“三、百、千”这套启蒙教材的特点：

1. 生字密度大，读的不多识字不少

“三、百、千”的生字密度大。《千字文》全文千字，个个不同，生字密度为 100%；《百家姓》也几乎如此，全书 472 字，用字 443 个，生字密度为 94%；《三字经》凡 1068 个字，用字 520，生字密度为 50%。三书连续学习可以累计识字 1452 个。三书的总字量为 2720 个，生字密度为 57%。儿童读的字数不多，但得益不少。复习巩固靠儿童反复诵读，这样读的量其实不少，生字反复见面，也就巩固了。

2. 知识教学与品德培养紧密结合

有的蒙学教材侧重知识教学，甚至重点在教识字，但也设法灌输一定

的思想内容和品德要求，如《千字文》。有的蒙学教材侧重进行品德培养，但不忽视知识教学，如《三字经》。人称《三字经》“若能句句知诠解，子史经书一贯通”。

3. 适合儿童年龄和心理特点

中国古代没有系统的儿童和发展心理学的知识，但有丰富的儿童和发展心理学的思想。蒙学教材的编写非常注意适合儿童的特点，如教材浅显易懂、形象具体、生动活泼，切于实用。各书都注意以典型人物、历史故事、民间谚语、流行成语作为重要内容。如《三字经》中的“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运用了孟母三迁和断机教子的历史故事。此外，还有大量勤学苦读的历史人物和生动故事。这是许多蒙学教材久远流传、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4. 注意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

蒙学教材都是采用整齐的韵语，以类相聚，或三字成句，或四字成句，句句叶韵，读来琅琅上口，听来铿锵入耳，易诵易记，饶有趣味。如《三字经》：“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千字文》：“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云腾致雨，露结为霜。”有的配以图画，更增强了形象感，如《绘图百家姓》、《绘图增注千字文》等。

今天看来，运用“三、百、千”特点，编写小学识字课本，未始不是可以试验的一途。

二、关于教学原则

在历时久远的语文教学实践过程中，先哲们总结了不少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而认识到一些必须遵循的规律，尽管不同时期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着眼，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归纳起来，仍有不少的共同点，举其大者，有五个方面。

1. 文道统一的原则

孔子一贯强调道，但也重视文。他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柳宗元总结他的经验时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宋代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德实也。”朱熹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元人郝经也认为：“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从上面引证的这些话中，所谓“文”即指文章的形式和语言，“道”指的则是文章的思想和内容。“文”与“道”的关系即是文章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语文教学中的“文道统一”的原





则，有两重含义：①由于文章是文道的统一，没有文就没有道，没有道也就没有文，因而教学时也同样要做到文道统一，即因文悟道，因道学文。通过形式了解内容，然后再根据内容掌握形式。②把语文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统一起来，即在进行语文教育时，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要紧紧地结合语文教育去进行。

2. 读写结合的原则

前人强调阅读对写作的基础作用，写作对阅读教学的促进作用，主张二者有机结合，认为这是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汉代的扬雄指出：“能读千赋，则能为文。”元人陈端礼说：“读书如销铜、聚铜入炉，大鞴（bèi，风箱）扇之，不销不止，极用费力。作文如铸器，铜既销矣，随模铸器。一冶即成，只要识模，全不费力。所谓劳于读书，逸于作文也。”这些论述正确地揭示了读书与写作的辩证关系，即读写两方面互相依存，互相作用，又互相渗透，互相贯通的。读好，有利于写好；写好，有助于读好。如此互相促进，就构成了学习语文的矛盾运动。这些观点既符合读写实践的客观情况，又符合现代阅读学中关于阅读的语文训练功能的原理。

3. 启发诱导的原则

学生在学习时，对某些问题弄不懂，经老师一加点拨，就豁然贯通。这种在教师主导下，调动、培养和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思考，探索知识，发展智力的教学活动就是启发诱导教学原则。关于启发诱导教学原则古人有很多论述。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什么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即是指积极思考，而又没有搞通的心理状态，这时需要的是引导学生怎样去想，叫做“启”；“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即是指整理思维，准备表达，遇到困难的心理状态，这时需要的是指导学生怎样表达，叫做“发”。孔子认为不造成“愤”、“悱”的心理状态，就不能进行教学。以后，《学记》又进一步发展了启发式教学思想。《学记》写道：“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就是说，优秀的教师善于通过诱导进行教学。这样的教师引导学生而不牵着学生走；策励学生而不推着学生走；启发学生而不代替学生做出结论。了解学生，认真备课是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前提；启发性设问、探索性讨论、揭示性讲析是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关键；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是进行启发式教学的目的。



4. 学思互依的原则

从语文教学的学科特点看，学与思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孔子告诫：“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朱熹主张：“读而未晓则思，思而未晓则读。”黄宗羲认为，要获得真正的知识，就必须深思穷源，若“无深湛之思，学之不成。”为了促使学与思的结合，古代学者特别提倡“学则须疑”。因为“疑”是学与思相结合的媒介。陈献章指出：“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陈献章讲得比较深刻。语文学中的学主要是语言训练，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认识、积累、区分、选取、巧用等能力的训练，这些能力的训练离开了思维训练的因素也就无法进行。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人们进行思考离不开语言。如果没有语言，就无法对观察到的事物进行准确、细致、周密的思维，也无法把思维的成果表达出来。因此，语言训练与思维训练相结合的原则是指导语文能力训练科学化的准则，必须贯彻在语文教学的始终。

5. 藏息相辅的原则

藏息相辅教学原则，就是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原则，这个教学原则首先是《学记》提出来的。《学记》曰：“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这里的“正业”是指课内学习，“居学”是指课外活动。《学记》又说：“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孙希旦解释说：“藏，谓入学就业也。修，修正业也。息，退而私居也。游，谓游心于居学也。”《学记》主张的“退息”时间的“游学”有两层含意：一是说使知识融会贯通，左右逢源；二是说要经常参加课外活动。古代学者提出的藏息相辅的教学原则是颇有价值的。我们说，课内课外语文训练相联结，这是一条语文教学的外部规律。学生得法于课内，发展于课外，是两者配合的客观效应。课内举一，课外反三；课内打基础，课外下工夫。课外是学习语文的大环境，是学生探索知识，历练能力，陶冶情操，修养品质，发展个性的广阔空间。然而，藏息相辅的教学原则提出两千多年来，直至今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行。我们有必要从古代语文教学藏息相辅的原则上获取一些有益的教益，把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还给学生，这是促进学生学习长足进步的重要保证。

三、关于教学方法

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的传统语文教学方法很多，其中行之有效的可以概括为熟读、背诵、勤写、模仿、循序。





1. 熟读

古人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读得熟，则不解说自晓其义也。”这说明熟读是理解文章思想内容和形式的基本方法。通过读，识记生字，掌握词语；通过读，培养语感，丰富知识；通过读，品味欣赏，消化吸收。在读的过程中，口诵心维，达到“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的境地。此外，古人还认为熟读对作文作用更大。唐彪说：“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作文时，吾意所欲言，无不随吾所欲，应笔而出，如泉之涌，滔滔不竭。”这确实是经验之谈。

2. 背诵

古人不仅重视熟读，还要求背诵，因为背诵是加强记忆，巩固知识，深入领会课文，提高读写能力的重要手段。在书院和私塾里，常常要求学生当堂背诵，下次上新课前，还要检查学生旧课背诵情况，背得不熟不上新课。学生背诵，教师要认真指导。唐彪说：“学生背书，必须使其声高而缓，先生用心细听，则脱落讹误之处，了然于耳，然后可以记其脱误，而令其改正。”谈到背诵，今人颇多非议，往往讥之为死记硬背，这是一种偏见。众所周知，少年儿童如“日出之阳”，朝气蓬勃，精力旺盛，他们智窦初开，求知心切，善于记忆，此时背诵，如石上刻的。农时不可违，学时也不可违，趁他们记忆的黄金时期，多花点精力用在背诵上，将会受用终身。

3. 勤写

在作文教学上，古人提倡勤写多作。唐彪说：“读十篇不如做一篇。盖常做则机关熟，题虽甚难，为之亦易；不常做，则理路生，题虽甚易，为之则难。”清朝的姚鼐也说：“大抵文字须熟乃妙，熟则利病自明。手之所至，随意生态；常语滞义，不遣而自去矣。”总之，要手笔熟，唯有多写，这是符合从写作实践中培养写作能力的规律的。为什么学作文非要勤写多作不可？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作文是一种比较复杂的能力，任何一种复杂的能力都需要经常的练习才能形成。事实证明，仅靠课本上规定的几次作文，学生的写作能力是很难提高的。“文必多作而后工”，我们要以多作为突破口，增加学生写作历练的次数，重视每次训练的质量要求，久而久之，“方入妙耳”。

4. 模仿

古人认为，学生作文是从模仿开始的。刘知几指出：“夫述者相效，

自古而然。”又说：“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朱熹云：“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纵观我国古代文学史，仿写的例子颇多。张衡仿班固《两都赋》而作《二京赋》；韩愈仿扬雄《解嘲》而作《进学解》；吴伟业仿白居易《长恨歌》而作《圆圆曲》。以上的一些例子无不说明效法他人的作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学习写作来说是行之有效的门径。现在有些语文工作者对仿写持有偏见，在他们看来仿写有碍于学生创造能力的发展。或云仿写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或云仿写是邯郸学步，亦步亦趋；或云仿写是东施笑颦，矫揉造作。我认为，这些看法都有悖于作文教学实践的。

5. 循序

我国传统语文教学很注重教学的程序和步骤，遵从循序渐进的客观规律。朱熹用十二字概括阅读教学的序：“自博而约，自易而难，自近而远。”意思是说：“先让学生大量地读，然后再少而精地读；先读比较浅显易懂的，再读高深难懂的，先读内容与学生比较接近的，再读与学生距离较远的。”他认为做到这十二个字，“乃得其序”。《中庸》把学习过程与认识过程统一起来，对教学步骤做了全面阐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就是说，第一步要多读一些，第二步从读过的书中提出问题；第三步根据提出的问题，慎密地思考一番；第四步通过思考，明辨是非、优劣；第五步将认识付诸实践。这个教学步骤是符合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这一认识过程的，也符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语文能力是要经过这一步骤逐步培养起来的。第一步，大量地阅读具体文章，这是认识的感性阶段；第二、三、四步，通过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的思维活动，对文章的内容及用词、造句、布局、谋篇等方面有所领悟，认识由感性阶段提高到理性阶段；第五步，把领悟到的东西再运用实践中去，身体力行。

上面，我对我国传统语文教学经验做了些分析和研究，其目的不是复古，而是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的、科学化的语文教学新体系而抛砖引玉。

白金声

目录

CONTENTS

积极汲取我国传统语文教学的宝贵经验（代前言）

一 言文教育	1
二 孔子	4
三 墨子	7
四 孟子	10
五 庄子	13
六 荀子	16
七 《学记》	19
八 《尔雅》	23
九 司马迁	26
十 《急就篇》	29
十一 王充	32
十二 《千字文》	35
十三 《昭明文选》	38
十四 《方言》与《说文解字》	41
十五 刘勰	44
十六 《颜氏家训》	47
十七 《蒙求》	50
十八 韩愈	53
十九 柳宗元	56
二十 欧阳修	59
二十一 王安石	62
二十二 苏轼	65
二十三 朱熹	68
二十四 《千家诗》	71
二十五 “四书”	74



二十六 “五经”	77
二十七 《神童诗》	80
二十八 《三字经》	83
二十九 《百家姓》	86
三十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89
三十一 王守仁	92
三十二 唐彪	95
三十三 八股文	98
三十四 古代的书院教学	101
三十五 《教子良规》与《训学良规》	104
三十六 《昔时贤文》	107
三十七 《弟子规》	110
三十八 《幼学琼林》	113
三十九 《唐诗三百首》	116
四十 《学海津梁》	119
四十一 《塾中琐言》与《训蒙辑要》	122
四十二 李渔	125
四十三 朱柏庐	128
四十四 《古文观止》	131
四十五 《文字蒙求》与《教童子法》	134
四十六 废科举，兴学堂	137
四十七 清末中小学《国文》教科书	140
四十八 “五四”白话文运动	143
四十九 王照	146
五十 《曾国藩教子书》	149
五十一 蔡元培	152
五十二 梁启超	155
五十三 徐特立	158
五十四 鲁迅	161
五十五 夏丏尊	164
五十六 吴研因	167



五十七	黎锦熙	170
五十八	刘半农	173
五十九	艾伟	176
六十	陶行知	179
六十一	陈望道	182
六十二	蒋伯潜	185
六十三	郭绍虞	188
六十四	毛泽东	191
六十五	叶圣陶	194
六十六	王森然	197
六十七	阮真	200
六十八	朱自清	203
六十九	吕叔湘	206
七十	辛安亭	209
七十一	蒋仲仁	212
七十二	斯霞	215
七十三	袁微子	218
七十四	张志公	221
七十五	祁建华	224
七十六	春晖中学	227
七十七	《中学生》	230
七十八	《国文百八课》和《文心》	233
七十九	《国文月刊》	236
八十	苏区的语文教材	239
八十一	“《红领巾》教学”	242
八十二	“集中识字”	245
八十三	“注音识字，提前读写”	248
八十四	标点符号	251
八十五	简化汉字	254
八十六	《汉语拼音方案》	257



八十七 《现代汉语词典》	260
八十八 “文革”前的两部《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263
八十九 “文革”后的两部《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266
九十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69
参考文献	272
后记	274



一 言文教育

言文教育，在这里特指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中期的语文教育。言，即言语；文，即文字。我国原始社会有许多氏族和部落，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不会是相同的。为了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他们使用各自的语言；为了生息、繁衍的需要，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并且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向本氏族和部落进行“言”“文”教育。

盘古开天地，有了人类便有了教育，正如马瑞临在《文献通考·学校考》中所说：“有人斯有教，有教斯可学，自开辟则既然矣。”教育是和人类同时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不过那时的教育还没有从劳动、生活中分离出来，而是统一的。因此，当时的语文教育的基本轨迹，首先在于它始终渗透在生产劳动和生活之中。人们基于吃、穿、住的需要，必须学习和参加渔猎、人工取火、缝制衣服、制造生产工具等活动；在氏族村落内部，人们参与选举、管理、集会、习武、祭祖祀神、节日欢庆、歌舞娱乐等活动；人人参加劳动，人人也同时接受教育，成人做什么，儿童也就跟着做什么，大人怎么说话，儿童也就跟着怎么说话。在这些生产生活中，处处包含有语文教育的因素。不过，这种语文教育在很长一个时期是通过“言”——口耳相传的形式来进行的。

古书中记载了一些原始社会诗歌产生的故事。《淮南子·道应训》记录：“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就是说，前面的劳动者——抬木头的，呼喊出“邪许”的声音，后面的就应和起来。正如今天的劳动号子一样，前呼“杭育”，后应“杭火”。这种呼喊和应和，是劳动时感情的自然流露。那么，用它和谐精神、协调动作的呼喊应和，就是古代社会的教育群体的方式和语言，也可以说就是一种最早的语文教育。

古书中记载了不少神话故事，它也是古代影响人、教育人的一种手段。至今这些神话故事，一直是丰富我们历代语文教育的一种手段。比如

《山海经》中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都是十分美丽动人的。这些神话故事，明显反映了原始人群在实际生活中克服困难、战胜灾害的信心和决心。精卫鸟填平大海，女娲氏炼石补天，这些事都不过是原始人类希望战胜天灾、改造自然的一种美妙幻想。后羿，也不过是原始社会创造出来的一个神奇射手，他的力量简直大得无与伦比，一箭将十个炽热的太阳射落九个。从此，万民欢喜，天下太平，旱象解除，禾苗长青。后来嫦娥奔月的故事，也是从此演化而来。这个故事，在后代的诗歌、小说、戏曲中常常引用，一直是我们语文教育的传统教学内容。

总之，在原始社会的文字尚未产生之前，神话传说不过是原始人群在劳动生产、生活之中的口头创作，这口头创作一经创作出来，就产生了教育人、鼓舞人的力量，而且这种创作过程，也就是原始人群相互教育、相互鼓舞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在原始氏族社会里，人人都是劳动者，人人又都是口头语言的创造者；每个人都是受教育者，每个人也都是教育者，每个人都是“言”者，每个人又都是受“言”者。它是人类社会教育的源头，也是我们语文教育的源头。

在氏族公社末期，文字产生了，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人们利用文字，既便于知识的记录积累，又便于知识的广泛传播，从而使信息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掌握文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进行文字教学，这就要有传授文字、从事施教的专门人员和专门的场所。可见，文字的产生促进了学校的萌芽。

我国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期就有学校的萌芽，开始叫“成均”。《周礼·春官》记载：“成均，五帝之学也。”后来叫“庠”，孟轲说：“庠者，养也。”意为庠是养老的场所。在氏族公社中，教育青年一代的任务通常是由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老人承担，而这种活动又应当趁老人的方便，一般就在养老的地方进行。所以，庠既是养老机构，也兼做教育的场所。学校的雏形出现以后，言语教育和文字教育有了较为固定的场所，人们在这里学礼、学射、学御、学艺，同时也学习说话、文字书写和认读。从此，比较完善的言文教育就以最粗放的形式得以实现了。

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中期以前的言文教育，虽然内容贫乏，形式简



单，处于混沌、粗俗的状态，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文教育，但是，它也为我国以后的语文教育提供了原始的经验。言文教育的基本经验之一，是语言来自于生活，生活是学习语言的大课堂。在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中，人们靠口耳授受的方式传播和学习劳动技能，从而促使口头语言不断发展，以至创造了言语、歌谣、神话、寓言等口头文学。这粗糙而生动的语言教育，既来自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可以说，体验生活就是学语言，学语言就是体验生活，广阔的社会生活就是学习语言的大课堂。言文教育的基本经验之二，在于文字读写训练是语文教育的基础。《易经·系辞》有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书”是写在竹帛上的文字，“契”是刻在木石或甲骨上的文字。前者用笔，后者用刀。由结绳而象形、书契，这是中国文字最早的发展史实，是语文教育发展的巨大的推动力。



二 孔子

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今山东境内）曲阜人。孔子少孤，出身微贱。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即是说：“我从小的时候就很穷苦，所以学会了许多值不得称道的技艺。”司马迁说他在做儿童游戏时，就喜欢玩祭祀一类的玩意儿；后来长大成人，曾做过季氏的“委吏”（管会计），还管过畜牧。他一生没有做什么大官，仅当过几个月的大司徒（管刑法），后来就郁郁不得志。

孔子 30 岁左右，开始从事教育活动。由于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很快就创设了较大规模的私学。据说他先后有弟子 3000，最喜欢的有 72 人。他看到当时的鲁国三桓两分公室，季氏掌握实权，遂离开鲁国到各国游说。他先后到过齐、宋、卫、陈、蔡等国，历时 13 年之久，到处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但到处碰壁，终不见用，最后仍回到鲁国，从事著述与教育。

孔子一生的主要成就是在文化教育方面。他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整理并发展了殷周以来的文化典籍，成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教本。这些教本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竹简上，被尊为“经”。孔子与其他儒生解释经义的文字，写在较短的竹简或木板上，成为“传”。有了儒家经传，并随着儒家学派的盛行，“六经”以外的书便渐渐不为人重视。而“六经”的流传，不仅影响于当时，而且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教学内容。

在中国及世界教育史上，孔子的教育思想有着重要的地位，他提出的一些教育主张，如关于教育对象、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道德教育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是一份珍贵的可资借鉴的历史遗产。

孔子的语文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之中。

孔子很重视“言”和“文”的学习。《子路篇》云：“一言可以兴